



中国古陶瓷研究会
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

中国古代陶瓷的外销

一九八七年
福建晋江年会论文集

紫禁城出版社

979

99

中国古陶瓷研究会
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
1987年晋江年会论文集

中国古代陶瓷的外销

紫禁城出版社

· 中国古代陶瓷的外销

中国古陶瓷研究会
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
一九八七年晋江年会论文集



紫禁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故宫博物院内)
北京华昌印刷厂印刷

787×1092 1/16 印张：11 字数：225千字

1988年11月第一版 1988年11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047-054-7/K·20 定价：4.00元

目 录

1. 河南唐三彩的创烧发展与外销..... 赵青云 (1)
2. 略论扬州出土的波斯陶及其发现的意义..... 顾 风 (5)
3. 从扬州出土的陶瓷资料看唐代的贸易陶瓷..... 周 林 (11)
4. 试谈长沙窑销售路线和兴衰的主要原因..... 周世荣 (16)
5. 唐山陶瓷的产生及外销..... 赵鸿声 (22)
6. 耀州窑外销陶瓷初析..... 嵇振西 (26)
7. 瓷器的外销与衡阳陶瓷业的繁荣..... 冯玉辉 (34)
8. 长沙铜官窑瓷器在广东..... 宋良璧 (39)
9. 试谈四川的古外销贸易瓷..... 陈丽琼 (45)
10. 安徽古代瓷器的生产与外销初探..... 李广宁 (50)
11. 试谈磁州窑在国外的影响及其传播..... 宗 毅 (55)
12. 从景德镇和梁子湖青白瓷的生产谈青白瓷的
外销和内销的关系..... 田海峰 (58)
13. 晋江磁灶窑的发展及其外销..... 叶文程 苏垂昌 黄世春 (61)
14. 试谈浙西宋元窑址及其产品的外销..... 季志耀 (66)
15. 略谈景德镇宋元瓷器外销..... 李再华 (70)
16. 元代景德镇青花瓷器的外销..... 张浦生 胡雅蓓 (77)
17. 大都城的青花瓷及元青花瓷外销..... 刘树林 (82)
18. 广东明代仿龙泉青瓷及其外销初探..... 曾广亿 (88)
19. 从阿迪比尔寺中的中国瓷器漫谈明代外销瓷..... 叶佩兰 (94)
20. 从中国瓷器的大量出土看中肯两国久远的
贸易交往..... 马希桂 (99)
21. “汝窑”及宝丰清凉寺窑址..... 邓城宝 (103)
22. 福建章浦宋元窑址..... 王文径 (106)
23. 福建南平茶洋宋元窑址再考察..... 林尉起 张文釜 (111)
24. 云南罗州窑和白龙窑调查纪要..... 葛季芳 (117)

25. 我国“南蕃古道”陶瓷外销初探..... 唐昌朴 (120)
26. 试谈澎湖航线与中菲陶瓷贸易..... 徐平章 (126)
27. 从《鄂多立克东游录》看我国元明时期陶瓷外销路线..... 胡 亮 (131)
28. 外销瓷的几个相关问题..... 陈振裕 (135)
29. 略述我国陶瓷的外销及其影响..... 王文强 (140)
30. 贡窑概论..... 童兆良 (147)
31. 秘色瓷考辨兼论蜀窑秘色瓷..... 董其祥 (152)
32. 《岛夷志略》中的“青白花瓷器”考..... 彭适凡 詹开逊 (158)
33. “内府”款小考..... 赵光林 (165)
34. 话说许世华兼论德化瓷塑断代问题..... 王冠英 (167)

河南唐三彩的创烧、发展与外销

赵青云

唐三彩是驰名中外的艺术杰作，因创烧于唐代而得名^①。它是用高岭土作胎，经过素烧之后，再用铜、钴、铁、锰等元素加入铅釉中作催化剂，涂在器物的表面，再入窑烧造而成。它以黄、绿、蓝三色做基调，经过复杂的窑变，进行自然调染，而流淌成多种颜色，一般釉色呈深绿、浅绿、翠绿、蓝、黄、白、赭、褐等多种色彩。

过去曾在洛阳和西安一带出土过大批唐三彩，但其产地和创烧时间一直是陶瓷学术领域中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先后在河南巩县发现了烧造唐三彩的窑址^②；八十年代又在陕西铜川耀州窑发现了烧造唐三彩的窑炉和作坊^③。经过考古发掘，获得了大量的实物标本。现就河南唐三彩的创烧、发展及其外销诸问题论述于后，就教于陶瓷界的专家、教授、学者。

一 河南唐三彩的创烧与发展

我国早期瓷器均属青瓷系统，河南安阳北齐范粹墓的随葬品中，最早出现白瓷^④，此后在濮阳李云墓内又发现有白釉加绿彩的四系罐^⑤，到了隋代的安阳张盛墓，还随葬有白瓷点黑彩的瓷器^⑥。两色釉的出现，打破了早期青瓷的单一色调。显然，白瓷的出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是后来各种彩绘瓷器的基础，为我国制瓷工业，开拓了广阔的前景。

大量的考古调查和发掘资料表明，唐三彩是在两色釉的基础上创烧成功的。当时已经掌握的色釉技术和工艺条件加上唐代盛行厚葬的风气，为唐三彩的生产，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唐代实行厚葬，可见于当时的典章。明文规定，不同等级的官吏，死后要随葬相应数量的三彩明器（包括各种器皿和俑类）。据《旧唐书·舆服志》记载：“……王公百官，竟为厚葬，偶人像马，雕饰如生，徒以眩耀路人，本不因心致礼，更相扇慕，破产倾资，风俗流行，遂兼士庶。”由此可见，唐三彩的生产无疑是适应了这种厚葬风气而兴起的，所以得以较迅速的发展。从有纪年的唐墓考察，早于高宗时期的唐墓没有出土过三彩陶器，因而说明唐三彩从唐高宗以后才开始烧制，而它的极盛时期当在开元时期。对巩县黄冶三彩窑址的调查与试掘结果表明，始烧于隋代的巩县黄冶窑的早期产品，是白瓷、青釉瓷和灰釉瓷。这些产品多为厚胎、假圈足，胎的瓷化较高，均已达到了结晶状^⑦；到唐代早期，黄冶窑开始出现了多种单色釉器物，如黄釉、酱釉、蓝釉等，然胎质仍较粗，外壁皆上半截釉，有的釉面不平，故欠光洁；有的釉面较薄，光亮莹润，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黄釉点绿彩的新工艺。此后，由双彩又逐渐发展为三彩或以黄、绿、蓝三色为基调，经过自然调染，窑变成五彩缤纷的唐三彩。这一事实，既反映了我国古代陶瓷由单彩到双彩再到多彩的工艺过程，也与多年来在各地唐墓出土的随葬陶器的实际相吻合，特别是盛唐前后，随葬唐三彩的数量之多、种类之丰富、工艺之精湛，均已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唐三彩很快发展成为珍贵的艺术品，蜚声国内外，受到各国人民的赞赏，并大量输出海外，成为中国与各国人民友好往来和中外文化交流

的实物见证。

从洛阳、郑州、南阳各地墓葬出土的唐三彩看，初唐的三彩器，釉色单调，一般以赭褐色、赭黄色釉为主，间以白色或绿色釉彩。采用蘸釉法，点施在肩部或白地素胎的印花、划花上面。由于釉厚，釉面不匀，往往形成蜡泪状，色泽暗淡无光，具有明显的初创的特征。盛唐时期，工艺进步，技术成熟，进而得到较迅速的发展。除了三彩器皿，更由于厚葬之风兴起，各类俑也大量出现。施釉除蘸釉外，还采用多种施釉技法，使器皿多上满釉，釉层匀净，色泽晶莹。色彩除绿、黄、白三种，又加以蓝彩和黑彩，别开生面。器表更富于装饰，除了划花和印花，还采用堆贴和捏塑工艺^⑧。花卉内容丰富多采，种类繁多，引人注目。到了中晚唐，政治动乱，特别是安史之乱，使唐朝由盛渐衰，新兴的三彩工艺也走向了下坡路，生产低下，技术衰退，虽勉强维持生产，但大多器形较小，造型简单，色调浓淡不一，施釉单薄，并常有脱釉现象，显得很不得景气。

然而，历史在不断前进，事物在发展。这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新工艺，在历史的变革中，终又获得了新生，如河南北宋时期的宋三彩^⑨，便是三彩器复兴的最好见证。从精美程度看，宋代三彩器正是在唐三彩工艺技术基础上的继承和发展，同时在一定意义上还有所创新。

二 河南唐三彩的品种与工艺特征

河南唐三彩以巩县窑为首创，鲁山、宝丰、禹县、密县、济源各地，晚唐直至北宋时期也相继生产，而巩县窑规模最大，品种尤多。根据发掘和调查所获得的标本，其种类可分：

1.生活器皿：三彩三足贴花奔马炉、三彩三足炉、三彩盂、三彩壶、黄釉壶、褐釉壶、素烧扁壶、绿釉注子、三彩罐、三彩碗、素烧碗、三彩瓶、三彩瓷盆、三彩杯、三彩豆，此外还有青瓷花瓶等。

2.生活用具：宝相花盘、绿釉水匜、三彩水池、素烧兔枕、三彩虎枕、三彩象枕。

3.三彩俑：骑马俑、三彩抱瓶俑、三彩女坐俑、素烧罗汉俑等。（从河南洛阳、郑州、南阳、新乡等地唐墓出土的俑类则更为丰富，有马俑、牵马俑、骆驼俑、牵骆驼俑、文官、武士、侍从、贵妇、少女、技乐、舞俑、天王俑和各种胡人俑。另外还有人身十二生肖俑、镇墓兽等。）

4.三彩玩具及其它：三彩卧狮、三彩小龟、三彩小狮、三彩小象、三彩小羊、三彩小狗、三彩叠猴、三彩小轿车、三彩鸡、三彩小马、三彩铃、三彩猴头哨、绿釉塔、素烧蹲狮、洁白瓷蛋丸等。

上述丰富的三彩造型，也显示了唐三彩制作的工艺水平。唐代不仅盛行厚葬之风，而且佛教也极盛行。佛教艺术对陶瓷工艺也颇有影响，如唐墓中出土有一种塔式罐，上有圆锥形盖，罐下另加一高把座，整件甚高，上小下大，恰似塔形。盖上常常堆塑浮雕装饰，器座饰有莲花纹样，整个造型和装饰艺术，都具有典型的佛教特征，再加上三彩的装饰美化，更显得美观大方，别出新裁。

鸡冠凤首壶在唐代也很流行，如在新乡发现的凤头龙柄壶，造型精巧，壶身贴有瑰丽的纹饰，从造型到装饰，特别是以三彩美化瓷面，具有形神俱佳，装饰新颖的独特风格。

总之，唐代三彩的器物造型，由笨拙粗重，逐渐变为精巧优美，色彩丰富，式样繁多，雕工精细，形象逼真，工艺娴熟，独具风格。尤其各类俑的制作，更是姿态优美，准确生动，对于不同身份、年龄、性别的人俑，塑造得完美得体，各具特色。如贵妇俑，身着宽服长裙，体魄端庄，神态安详，文静大方；少女俑则俏丽飘逸，身姿窈窕，含羞微露，轻盈俊秀；

而武士俑，身躯彪壮，威武有力，表情威严，气势逼人；侍从俑体态亲善，表情恭顺；舞乐俑千姿百态，或群舞欢跳，或高歌伴唱，或击鼓吹奏，记录了当时舞乐的欢快场面，同时也刻划出各种人物的内心世界。唐三彩俑以纯熟的技艺和独特的手法，显示了各种人物的不同性格与精神面貌，具有感人至深的艺术效果^⑩，加上色彩富丽，莹润明亮，装饰华贵，更加惹人喜爱。

河南唐三彩的烧造工艺分素烧和釉烧(即复烧)两道工序,并可分陶胎和瓷胎两种。一般烧成温度较瓷器偏低,在800℃—1000℃之间,其中唐三彩俑的坯胎烧成温度在900℃左右;唐三彩器皿的温度大都在1000℃左右。一般唐三彩釉料中所含原料的化学成份为二氧化硅(SiO₂)、二氧化钛(TiO₂)、三氧化二铝(Al₂O₃)、三氧化二铁(Fe₂O₃)、氧化钙(CaO)、氧化镁(MgO)、氧化钾(K₂O)、氧化钠(NaO)和氧化铅(PbO)。氧化铜(CuO)在各种色釉中也普遍存在,仅黄釉中未有发现。蓝釉是一种较晚出现的釉色,除了含有上述化学成份外,还有氧化锑(SbO)、氧化钴(CoO)两种化学成份。上述各种色釉的化学成份,既有共同之处,也有各自的比例。如氧化铁呈色剂,在褐色(红色)釉中含量为4.3%,绿色釉中含量为0.2%,黄色釉中含量为1.5%,蓝色釉中含量为1%左右;又如氧化铜呈色剂,在褐色(红色)釉中含量为0.31%,绿色釉中含量为0.2%左右,蓝色釉中则为0.3%。尽管如此,由于对色泽深浅浓淡的具体要求不同,同一种釉药,在配制过程中的各种呈色剂及其化学元素的含量的比例,也不尽相同。因此唐三彩的烧制,不仅造型讲究,雕塑完美,工艺精湛,特别在色釉上,对于各种元素的配方比例,能严格控制,以不同的含量比例,呈现更多的色彩,从而使唐三彩器成为万紫千红、绚丽多彩的艺术品。

考古资料表明,河南唐三彩,除少数红色陶胎为普通陶土烧成外,多数为比较纯净的白色高岭土加工而成,含铁量为0.5%左右,素烧后胎为白色。这种泥料的基本特点是:“一、吸水性能强,可以使粘接部分坚牢,又能在凉干时不致裂口;二、具有较强的可塑性,在塑造时不粘手;三、经过火烧,强度大大增加,较一般陶质结实;四、素烧后胎质变白,挂釉后釉色鲜艳。”^⑪正是由于这些基本特点,加上造型生动,颜色鲜艳,窑变美妙,五彩缤纷,唐三彩成为中国古陶瓷艺苑中一支盛开的奇葩,具有引人入胜的艺术魅力,为我国陶瓷工艺美术史,增添了灿烂的光辉,为宋元以后,直至明清历代的各种美术陶瓷,开拓了新的境界,成为我国古代陶瓷艺术宝库中一颗绚丽夺目的明珠,在我国陶瓷工艺美术发展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三 河南唐三彩的外销

唐代河南各地窑口兴起,瓷业勃兴,不仅生产日用的陶瓷,最大限度地满足当时人民的日常生活需要,特别由于李唐一代,盛行厚葬,唐三彩成为风靡一时的新工艺和畅销产品,除适应当时的厚葬之风,还大量输出海外。这对于中国和当时的有关国家和地区进行物质文化交流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据目前资料可知,河南唐三彩在日本、朝鲜、印度、巴基斯坦、埃及、伊朗以及东南亚国家均有出土^⑫。

目前大家公认,中国的陶瓷输出路线,一条是通过陆上“丝绸之路”远销西亚;而另一条则是日本陶瓷学者三上次男所称的海上航线——“陶瓷之路”。

1954年—1969年日本玄海滩发现唐三彩陶瓷碎片二十二片,在奈良市大安寺的金堂与讲堂之间的烧土层里还发现有唐三彩陶器和绞胎陶枕,仅绞胎陶枕就有三十多件,这应属于巩县窑的作品无疑。1969年在奈良县福原市安部寺旧址西北出土有唐三彩兽足残片,在药师寺

西僧房遗址，还发现有中国的白瓷和长沙窑的青瓷壶等。

在印度尼西亚也出土有唐代越窑、长沙窑的产品，与其同时出土的还有河南唐三彩器皿。

埃及上京的福斯塔特城，十三世纪初叶已成废墟。考古学家曾在这里发现许多中国的陶瓷碎片，日本学者小山富士夫从中拣到越窑青瓷六百余片，还有不少唐代白瓷和三彩器碎片。

河南陶瓷中的唐三彩、白瓷以及绞胎等，在不少地方皆有发现，说明当时的窑口，不仅满足了当地人民的日常生活所需，而且还远销国外，这对于当时中外文化交流无疑起了积极的作用。

河南洛阳是我国隋唐时期中原地区的大都会，也是当时我国对外关系中水陆两路的交会点，即闻名世界的“丝绸之路”的东端，外国商人经广州、洪州、扬州，而抵洛阳西去长安的水路的终点，是东方和南方到达西京长安的必经之路。洛阳等地唐墓出土的各类胡人俑，反映了当时我国与欧亚各国进行丝绸贸易的情景，另外在不少唐墓中也相继发现外国的银币和文物。在出土的三彩器中除人物俑、动物俑（包括马和骆驼）外，还有圆口小瓶和凤头壶等。这些皆为中原烧制的三彩器，在丝绸之路沿线和海上交通线附近的不少国家内均有发现^①。这些文物，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各国人民同中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历史。

① 《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出版。

② 《巩县唐三彩窑址调查》，《中原文物》1981年第3期；《巩县黄冶“唐三彩”窑址的试掘》，《河南文博通讯》1978年第1期。

③ 《铜川黄堡发现唐三彩作坊和窑炉》，《文物》1978年第3期。

④ 《河南安阳北齐范粹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1期。

⑤ 《河南濮阳北齐李云墓出土的瓷器和墓志》，《考古》1964年第9期。

⑥ 《安阳张盛墓发掘记》，《考古》1959年第3期。

⑦ 《河南钧瓷·汝瓷与三彩》，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7年出版。

⑧ 《洛阳唐三彩》，文物出版社，1980年出版。

⑨ 《济源勋掌宋三彩窑址》，《河南古瓷窑址资料汇编》，1985年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编印；《两件宋三彩枕》，《文物》1981年第1期。

⑩ 《中国陶瓷》，文物出版社，1985年出版。

⑪ 《洛阳唐三彩》，文物出版社，1980年出版。

⑫ 《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出版。

⑬ 《洛阳唐三彩》，文物出版社，1980年出版。

略论扬州出土的波斯陶及其发现的意义

顾 风

1965年2月扬州博物馆的同志在扬州汽车修配厂（今扬州客车制造厂）附近征集到一件出土的双耳绿釉大陶壶，此壶造型饱满，胎骨厚重，釉色匀润，长颈丰肩，鼓腹小底，限于当时的认识水平，以为这是一件鲜见的唐代绿釉陶器。

1982年开始，扬州市在新拓宽的三元路北侧开始进行市政建设，有人在三元路副食品商店基建工地上又采集到一种表面带有突起的弦纹、连珠纹和锯齿形棱角的绿釉陶片，当时也未能引起大家的重视。

1983年下半年，冯先铭、李知宴两位专家先后来扬。经冯先生鉴定，这种采集到的绿釉陶片是波斯陶片。时隔不久，李先生在扬州博物馆参观时，认定扬州博物馆收藏的那件双耳绿釉大陶壶是典型的波斯安福拉式陶器，从而引起了扬州文博界同行的注意和重视。

之后，人们又在扬州三元路北侧的人民银行、纺织品公司、邮电局、市直机关幼儿园，扬州城北的教育学院学生宿舍大楼，汶河路西侧的扬州商场、文园大酒家等基建工地，以及扬州南通西路唐城遗址考古发掘现场，发现和采集到一批相同的标本。前后累计，总数达二、三百片之多。

扬州出土的这批波斯陶片，具有一些显著的特征：一是胎色多呈淡黄，且色泽鲜妍，与我们以往所见到的汉唐陶器，包括三彩类陶器有明显的区别；二是这类陶器胎质疏松，胎骨和釉层往往厚于国内同时期的釉陶器皿；三是胎釉结合比较紧密，除在部分标本的釉层上发现冰片状的裂纹外，基本无脱釉现象，反映了波斯生产的这类陶器胎釉膨胀系数大致相同，而且，胎釉的烧融温度也比较接近；四是这类器物的口沿上留有支烧痕迹，说明这类陶器是单个覆烧或对口合烧的；五是这类陶片标本中既有釉质匀润，发色鲜艳，表面具有玻璃光泽的优质产品，也有表面凹凸不平，黯淡无光，带有明显烧造缺陷的劣等产品；六是这批陶片釉层表面，尤其是内表面都有云母光泽或粘有云母状物质，类似我国汉代绿釉陶器和三彩器表面的“银化”现象^①。

扬州出土的波斯陶片，曾取样送请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分析。现根据该所张福康先生所作的化学分析得出的结果^②和该所以前发表的东汉绿釉陶器胎釉分析数据^③，列表加以对照研究：

从上面的分析结果我们可以看出，波斯陶的胎釉化学成分与我国汉代绿釉陶器有着明显的区别。波斯陶的胎体氧化钙的含量竟高出我国汉代绿釉陶胎体氧化钙含量的9倍。尤其是釉的化学成分，两者之间存在的差别更大。波斯陶釉中二氧化硅的含量为我国汉代绿釉陶中二氧化硅含量的一倍左右，我国东汉绿釉陶器的生产使用的是铅釉，而波斯陶器所用的则是一种不含铅的碱金属釉。铅的化合物在釉中能起降低熔点增加流动性的作用，所以，铅釉在700℃

		化学成份	SiO ₂	Al ₂ O ₃	TiO ₂	Fe ₂ O ₃	CaO	MgO	K ₂ O	Na ₂ O	MnO	P ₂ O ₅	CuO	SnO ₂		
胎	含量	波斯陶	49.66	13.10	0.49	6.26	16.52	6.36	1.29	1.88	0.14	0.72	—	—		
	%	汉釉陶	65.78	15.85	0.99	6.23	1.84	2.19	3.30	1.60	0.13	0.10	—	—		
		化学成分	SiO ₂	Al ₂ O ₃	TiO ₂	Fe ₂ O ₃	CaO	MgO	K ₂ O	Na ₂ O	MnO	P ₂ O ₅	CuO	SnO ₂	PbO	
釉	含量	波斯陶	87.02	5.19	0.16	1.31	6.44	2.56	3.80	7.71	—	—	2.49	0.20		
	%	汉釉陶	33.88	6.20		2.31							1.26		46.89	

左右便开始熔融。我国汉唐以来的釉陶产品都是采用的含铅量较高的低温釉料，波斯陶的釉中既不含铅化物，那么，它的烧造工艺就可能与我国釉陶器的生产工艺不同，也许这类陶器是在高温条件下烧成的。

波斯陶的釉中不含铅化物，结果除了一部分优质产品外，不少标本表面都粗糙黯淡，出现不同程度的“桔皮”、“针眼”、“气泡”等烧造缺陷^④。可见，宏观观察的现象与微观分析的结果是相互吻合的。

铅釉技术的发生问题，是我国陶瓷研究有待解决的课题之一，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观点认为，这种碱金属硅酸釉早已在埃及发明，后传到美索不达米亚、波斯和西域一带，我国的铅釉技术是从西域引进的^⑤。另一种意见认为，中国的铅釉是祖先自己创造的^⑥。考虑到釉是一种玻璃质，它的成分与玻璃大体相似，因此，对中外古玻璃标本进行定性的比较研究，有助于深入研究并解决我国铅釉的发生问题。根据以往国内外研究者对我国古代遗址出土的玻璃器物进行分析研究的结果，认为我国战国和西汉的玻璃（料器）的化学结构属于PbO—BaO—SiO₂系统，而古埃及和地中海沿岸地区出土的玻璃，其化学结构到目前为止均属Na₂O—CaO—SiO₂系统，只有少数玻璃含有少量的氧化铅^⑦。这次对波斯陶釉成份的化学分析，得出的结果很有可能与以往国外研究者对西亚地区出土的玻璃材料化验分析的结果相近或相似。因此推测，这种波斯陶器的釉料成分也应属于Na₂O—CaO—SiO₂系统。如果确实无误的话，那就为我国自行发明铅釉技术的学术观点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旁证。

据目前国内已发表的资料而论，出土波斯陶器的只有福州和扬州两个城市。发现完整的波斯陶器仅四件，即1965年扬州东南近郊出土的一件双耳绿釉大陶壶；1965年福州市郊莲华峰五代南汉国南平王次女、闽国第三主王延钧夫人刘华墓出土的三件孔雀蓝釉的陶罐^⑧。由于刘华葬于长兴元年（930年），有绝对的年代，因此，作为随葬品的波斯陶器就有了断代的依据。同时，也为扬州出土的波斯陶的断代和研究提供了许多方便。福州刘华墓出土的三件波斯陶罐，敛口、广腹、小底，肩部有三或四个环耳，腹部还贴饰半圆弧条纹或平行的绳纹^⑨，造型修长秀丽，发色偏蓝，造型风格和装饰手法都与扬州出土的双耳绿釉大陶壶有明显的区别，因此推测，扬州出土的双耳绿釉大陶壶与福州刘华墓出土的孔雀蓝陶罐，在制作年代上可能有早晚之分。

扬州陆续发现的波斯陶片数量较多，它们基本上都是壶罐一类器物的碎片，虽然品种不多，但每种器物的器型有大、中、小之分，而且，发色也不尽相同。其中既有类似本地出土的双耳绿釉大陶壶的碎片，也有器表纹饰类似福州刘华墓出土的孔雀蓝陶罐的碎片，还有纹

饰和发色与两者都不相同的标本。这批陶片除少数出于宋元扰乱层中，大多数都是在距今地表1.8—2.2米深的中晚唐、五代地层内发现的。与这批波斯陶片伴出的都是中晚唐、五代时期的遗物。其中有越窑青瓷片、宜兴涧众窑青瓷片、长沙窑青瓷片和彩釉瓷片、寿州窑青瓷片；邢窑、定窑、河南巩县、密县等地烧造的白瓷片、三彩陶瓷片，以及过去鲜为人知的唐代青花瓷片等。

扬州出土的双耳绿釉陶壶的征集地点在今扬州市东南近郊。根据以往考古调查和考古发掘所掌握的资料，这一带是唐扬州罗城外的唐人墓葬区。征集到的波斯大陶壶保存十分完整，很可能就出自墓葬之中。由于过去这一带及其邻近的地区发现的几乎全部是唐代中晚期的墓葬，因此，那件双耳绿釉波斯大陶壶应是中晚唐墓葬中的随葬器物。根据波斯陶在扬州的出土情况，参考福州刘华墓的出土资料，我们认为，1982年以来，扬州发现的波斯陶片，除少数时代可能稍晚一些以外，大多数应是八世纪晚期至九世纪的产品。

日本出版的《波斯美术》一书中介绍过一件波斯青釉双耳壶，壶高22.5厘米，造型和装饰手法与扬州出土的双耳壶极为相似。但书中标定的年代为“前二——后三世纪。”^⑩显然断代偏早。

国外发现并得以完好保存的这类波斯大陶壶数量不多，其中菲律宾吕宋岛八打雁地区的塔尔遗址也曾出土过一件。壶高35.66厘米，双耳细颈无花纹^⑪。日本已故著名陶瓷专家、多年致力于波斯—伊斯兰陶器研究的三上次男先生认为，“从这只壶的造型，釉色和制造工艺看，均可确认它是公元十世纪前后制造的青绿釉陶器。”^⑫

斯里兰卡的西吉利也出土过残破的波斯青釉水壶和一些陶片，伴出的还有越窑青瓷五件和部分青瓷碎片^⑬。国外研究者认为，这批波斯陶是十三世纪的东西，而中国的越窑青瓷是十世纪的产品，两个距离遥远的国家不同历史时期的产品竟同时出土，有些不可理解，他认为，“这是非常耐人寻味的事。”^⑭根据波斯陶在扬州的出土情况我们推测，斯里兰卡西吉利出土的那批波斯陶片同与其伴出的中国越窑青瓷时代相近，均为九、十世纪的产品。西吉利波斯陶的出土情况，不仅客观地反映了历史事实，而且对扬州、福州所出土的波斯陶器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

扬州出土波斯陶片，是当时我国和西亚地区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增进的实物见证。

我国和波斯都是世界上古文明发达的国家。据史籍记载，早在公元前二世纪，两国便开辟了陆上和海上的贸易通道，并建立了政治联系和文化交流。到了唐代，这方面的活动更达到了一个高峰。从贞观十三年（639年）二月，到长庆四年（824年）九月，见于史籍的交往就有三十次之多^⑮。

中西交通经过了大约九个世纪的发展，到唐代已经形成了七条与外国交通的主要线路^⑯。其中“安西入西域道”和“广州通海夷道”都是与西亚陆上和海上联系的重要干线，当时两国的交往，早期主要经由“安西入西域道”的陆上通路。河陇一带沦陷于吐蕃以后，“广州通海夷道”的海上通路便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唐以前，南方的交州、广州一直是国内最重要的通商口岸和外贸市场。外国商人从海上运来珠宝、香料等奢侈品，带走的是丝绸等物品。由于当时陆路是中外交通的主要途径，加之航海业还不很发达，所以到公元四世纪末的萧梁时期，“每年舶至不过三数”，最多“岁十余至”^⑰，而且贸易活动的范围仅在港市附近。逮至唐代，海上交通渐趋发达，加之政策

有利，所以取道海上来华贸易的商人不断增加。他们除了在沿海几个港市进行商品交易外，还逐渐把贸易活动的范围扩大到中国内地。唐代前期，外国商人在广州登陆后，北上谋利多取道大庾岭，经洪州，再沿赣江入长江，而后抵达扬州。或再从扬州沿大运河转赴洛阳、长安。很长时间，扬州一直是外商由东南沿海北上长安的必经之地。中唐以来，对外贸易不断扩大，扬州已拥有当时国内最繁荣的贸易市场，吸引了大批外商。外国商船循海路入长江，直接驶抵扬州，显然比他们在广州卸货后再行转输要方便经济。上述种种因素，使得扬州港的地位不断提高。“隔海船通舶，连河市响楼”^⑧、“江火明沙岸，云帆碍浦桥”^⑨、“夜桥灯火连星汉，水郭帆樯近斗牛”^⑩，当时港口的繁荣，从中可窥一斑。

由于扬州是当时的经济中心和对外交通的直达港口，所以在扬州活动的外商特多。这在史籍和唐人笔记小说中屡见不鲜。仅《太平广记》援引的唐人著作中有关波斯、大食商人在扬州活动的记载就有许多条^⑪。他们在扬州坐贾行商，主要经营珠宝、香料和药材，同时还买卖丝绸，并高价收购中国的奇珍异宝。他们还开设“邸店”，代客商存放货物，拨兑银钱，甚至还发放高利贷。他们以扬州为基地，到全国各地进行商业活动。有人“商贩于此，已逾二十年”^⑫。

据《旧唐书·邓景山传》记载，肃宗上元年间（760—761年），“会刘展作乱，引平庐副大使田神功兵马讨贼。神功至扬州，大掠居人资产，鞭笞发掘略尽，商胡大食、波斯商旅死者数千人”。曾经来华的阿拉伯商人苏莱曼·丹吉尔在他的著作《东游记》中提到，晚唐时期广州的外国侨民有十二万人之多。而扬州在中晚唐时期的经济地位和繁荣程度都在广州之上，估计当时侨居在扬州的大食、波斯等国的商人，其总数也相当可观。

扬州在唐代虽然是国内外商贾云集并从事商业活动的主要地方，但由于唐末“自（毕）师铎、秦彦之后，孙儒、杨行密继踵相攻，四、五年间，连兵不息，庐舍焚荡，民户丧生，广陵之雄富，扫地矣”^⑬；加之距今年代久远，当时的遗物、遗迹已经不多，能反映中外交通的文献资料更为稀少。1963年，扬州市东北近郊五台山一带曾出土了一方唐光启二年（886年）“河东郡卫氏夫人墓志”。据志文记载，卫氏“育子五人，二男三女，长子曰延玉，次曰波斯”；1975年，在扬州城西苏北农学院（今江苏农学院）唐代手工业作坊遗址中，发现了一些胡人陶范和三彩人面；同年，扬州的唐墓中还出土了几件高鼻、深目、虬髯、张口露齿的胡俑和著翻领胡服的侍女俑；1980年，扬州北郊又出土了一件唐长沙窑的青瓷背水扁壶，壶身正面有釉下绿彩书写的阿拉伯文，意为“真主最伟大”。唐人为儿子取名“波斯”，又以波斯、大食、马来、印度等国人的形象制作陶瓷玩具和陶俑。这些出土的文物资料从侧面间接地反映了当时在扬州的外商人数多，影响大。而1965年，特别是1983年以来，扬州出土的波斯陶才是直接反映外商在扬州活动的珍贵资料。

除中国的扬州和福州以外，据国外发表的有关资料统计，亚洲地区发现这类波斯陶器的有伊朗的席拉夫（Siraf）遗址、内沙布尔（Nishapur）遗址；伊拉克的萨马拉（Samarra）遗址；巴基斯坦的班波尔（Bambhor）遗址；斯里兰卡的曼泰（Mantai）遗址、阿努拉达普拉（Anuradhapura）遗址、西吉利遗址；菲律宾布端（Butuan）市的安巴高（Ambago）遗址，吕宋岛八打雁（Batangus）地区的塔尔（Taal）遗址；泰国的柴亚（Chaiya）遗址等。这些出土地点都是公元九、十世纪繁荣的都市或海港，是东西方海上贸易通道上的枢纽和货物集散地。在上述地点发现大量的中国陶瓷和数量不等的波斯陶器是不足为怪的。

这类波斯陶器除在位于孟加拉湾和阿拉伯海湾交界处被称为东西方文化交流十字路口的

斯里兰卡大量发现以外，在东南亚、东亚地区过去只有零星发现。中国扬州发现数量较多的波斯陶不能不算值得注意和重视的一个特例。

据斯里兰卡曼泰遗址出土的这一时期的文物分析，那里出土的波斯陶和中国陶瓷的数量大致相等或稍多一些，并与同时代的伊朗的席拉夫遗址、巴基斯坦的班波尔遗址出土文物的情形非常相似^①。这就说明波斯陶器可能是当时的一种外销商品。但三上次男先生认为，“这些伊斯兰陶器多数是作为油、葡萄酒、水的容器，”^②与商人水手在海上长期生活有关。曼泰、席拉夫、班波尔都是海上交通地位十分重要的海港城市，是商人和水手经常出没居留的地方，这类日用器皿兼作商品也未尝不可。此外，如果葡萄酒是当时波斯重要的外销商品的话，这类陶器便是装葡萄酒的容器了。

中国是当时世界上的陶瓷生产王国，陶瓷已作为一种主要商品不断外销。三上次男先生认为，斯里兰卡以东地区之所以发现的波斯陶数量不多，原因就是受到了中国优质外销陶瓷的持续排挤。但这类陶器被带到中国以后，却以它鲜妍的色彩，新奇的纹饰，丰满匀称的造型备受唐人的青睐，以致被作为王妃的陪葬器物。虽然如此，从扬州出土的情况看，波斯陶在这里还不足说明是作为单独的外销商品出现的。

根据国外考古调查和发掘的资料分析，中国的陶瓷作为海上贸易的主要商品是进入九世纪以后的事情。在亚洲上述的这些重要遗址，以及日本、朝鲜各国同一时期的遗址内，出土的中国陶瓷主要品种为青瓷、白瓷、长沙窑彩瓷。从这一基本组合规律中我们了解到，当时中国外销瓷的主要产地和窑口，即是以生产青瓷为主的浙江的越窑、以生产白瓷为主的河北的邢窑、定窑、河南诸窑和以生产彩绘、模印贴饰青瓷为主的湖南长沙窑。我们在扬州罗城（今扬州市）范围内调查发掘了二十几处中晚唐时期的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陶瓷片。瓷片的基本组合与国外许多同时期遗址的出土情况十分相似，这不是偶然的巧合。

唐代，扬州是与交州、广州、明州并列的四大港口。其中交州、广州与东南亚、西亚各国海上交通历史悠久，是众所周知的中西海上交通的直达港。具有明显外销倾向，并带有浓郁西亚风格的长沙窑陶瓷产品除在国外被大量发现以外，国内仅有扬州、明州等少数城市出土，而扬州出土的数量多，品种全，堪称第一。扬州是当时世界上著名的商业都市和港口，过去，由于缺乏出土资料，对她在海外交通的地位未能充分认识，现在在这里不断发现大批优质的长沙窑产品，越窑青瓷，河北邢窑、定窑，河南诸窑的白瓷产品，还有数量较多的波斯陶片。因此可以确认，扬州港在我国早期海上陶瓷贸易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她不仅是当时中日交通的直达港，而且是中国与西亚各国海上交通的直达港。

① 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115—116页。

② 周长源《扬州出土古代波斯釉陶器》，《考古》1985年第2期。

③ 同①。

④ 同①。

⑤ 叶喆民《中国古陶瓷科学浅说》75页。

⑥ 张福康、张志刚《中国历代低温色釉的研究》，《硅酸盐学报》1980年第1期。

⑦ 于福熹、黄振发、萧炳荣《我国古代玻璃的起源问题》。

⑧ 福建省博物馆《五代闽国刘华墓发掘报告》，《文物》1975年第1期。

⑨ 同⑧。

⑩ 《オムメントの美术》101页，图版103。

- ⑪ 三上次男《从陶瓷贸易史上看东南亚出土的伊斯兰陶器》，《白水》NO.10, 1984。
- ⑫ 同⑪。
- ⑬ 三杉隆敏《探索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国瓷器》，《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资料》第三辑，92页。
- ⑭ 同⑬。
- ⑮ 张星娘《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三册，112页。
- ⑯ 《新唐书·地理志》。
- ⑰ 《南史·萧勛传》。
- ⑱ 李洞《送韦太尉自坤维除扬州》。
- ⑲ 祖咏《泊扬子津》。
- ⑳ 李绅《宿扬州》。
- ㉑ 《太平广记》卷17《神仙类·卢李二生》、卷33《神仙类·韦龔》、卷220《药类·句容佐史》、卷402《宝类·宝珠》、卷402《宝类·李勉》、卷402《宝类·守船者》、卷403《宝类·紫辣羯》、卷403《宝类·玉清三宝》、卷421《龙类·伍瑛》等。
- ㉒ 《太平广记》卷402《宝类·李勉》。
- ㉓ 《旧唐书·秦彦传》。
- ㉔ 同⑪。
- ㉕ 同⑪。

从扬州出土的陶瓷资料

看唐代的贸易陶瓷

周 林

扬州是我国古代历史文化名城之一，自春秋末年吴王夫差开邗沟、筑邗城以来，迄今已有二千四百七十多年的历史。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它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特有的自然条件，历秦汉至隋唐，在经济上一跃发展成为我国的东南重镇。唐代的扬州不仅是国内最负盛名的经济都会，而且还是主要的商业集散地和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在中国陶瓷对外贸易中也起过重大的作用。近几年来扬州市区先后出土了大量的古代陶瓷资料，特别是国家文物局扬州培训中心八三年举办古陶瓷鉴定班以来，师生们结合教学，在市区各基建工地上发现采集了一批重要的古代陶瓷残片，这些陶瓷资料不仅丰富了教学内容、提高了教学效果，并为我们研究古代经济发展史和古代对外贸易情况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本文拟以采集到的部分唐代陶瓷残片资料结合同时间发现的国外陶瓷工艺品对唐代的陶瓷贸易进行一些初步的探讨。

一 优越的地理位置发达的经济基础汇集着众多的陶瓷品种

扬州位于长江入海口的内侧，唐时东至大海仅二百里左右的航程（扬州东至海陵界九十八里，海陵东至大海一百零七里），^①又居我国东部沿海的中心点，上有江西、湖广、四川等广大区域作腹地，下可使船舶直接进出。特别是公元六世纪末叶，隋炀帝开运河促使扬州处于长江和运河的交会点，因而成为我国东西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和对外交通贸易的重要港口。所谓“广陵当南北大冲，百货所集”^②正说明了这一点。优越的地理位置为东西南北的陶瓷产品汇集扬州提供了必要的先决条件；扬州自身发达的经济基础也是众多陶瓷品种汇集而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内部因素。否则商人无可买卖来此何为。有关唐代扬州经济繁荣的情况，史书中不乏记载，如“江淮之间，广陵大镇，富甲天下”^③、“扬州富甲天下，时人称扬一益二”^④等等。这些都从侧面反映了当时扬州经济发达的情况，更主要的是扬州周围地区有着丰富的矿产和发达的工场制造业以及精良的制造技术，农副产品资源也很丰富。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开元、天宝中扬州的贡品即达二十四种之多。这样就更吸引了四方商贾，同时也为扬州开展陶瓷贸易带来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我们知道，中国古代陶瓷是商业贸易中的重要产品之一，海外贸易事业的发展与陶瓷产品的需求量是成正比的。随着唐代经济文化的繁荣和对外贸易的发展，陶瓷生产也呈现出一派生机。这时期的制瓷业打破了以往青瓷一统天下的局面，出现了“南青北白”的新景象，扬州港也以其优越的交通条件和发达的社会经济使全国各大窑系的产品汇集到一起。近年来扬州出土的唐代陶瓷产品数不胜数，全国各大窑口品种均有发现。现将扬州出土的陶瓷资料中当时影响较深的几个主要窑口的产品情况简介如下：

长沙窑：这是近几年扬州出土的陶瓷资料中数量较多的一个窑系。品种有壶、罐、盒、盆等，还有各种瓷塑玩具，小巧玲珑，形态生动，使人爱不释手。从釉彩上来讲有青釉、黄釉、白釉、绿釉、酱釉、黑釉、青釉绿彩、青釉贴花、釉下褐绿彩、釉下彩绘、白釉绿彩、酱釉印花和带诗文词句的壶、罐类器物残片等。其中以扬州汶河路出土的黄釉褐蓝彩双系大罐最为突出，是长沙窑产品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力作。^⑥另外还发现了长沙窑产品中以铜红为着色剂烧制的釉里红器物残片，这对探讨我国釉里红瓷器的产生和发展有着重大的科学意义。

越窑：唐代南方青瓷的主要代表。器物残片中有的釉色青中微带黄色，俗称“艾色”。胎色多为灰白，少量的颜色较深，质地致密，釉层匀净、滋润而不透明，好似黄玉。造型以碗、盘、执壶为主，还有油盒、水盂等。碗的形式较多，有荷叶形碗、海棠碗、葵瓣形碗等。前期多玉璧底，后期为玉环底。执壶往往为瓜棱状，壶咀较短。纹饰有刻花和印花两种。

邢窑：唐代北方白瓷的代表。出土器物主要有碗、执壶、托盘、盒、盘、盏等。其中以碗、壶居多。胎骨坚实致密，胎色洁白、瓷化程度高，釉色雪白滋润，很少开片，釉厚处呈浅水绿色，修坯工整。碗、盘圈足多为璧形底，轮旋极规整，玉璧底心多施釉，底足外缘多切削成斜棱状。

曲阳窑：北宋定窑的前身。以烧白瓷为主，出土器物基本和邢窑相同，分粗、细两类品种。细瓷和邢窑大致相似，只是足根轮旋不太规整，玉璧底心很少施釉，釉水凝聚处多呈青绿色，釉面有开片和垂流现象。粗瓷胎较厚实，断面较粗，胎色略发灰黄，施化妆土，釉面白中闪黄。碗多厚唇，有的还有卷口，有玉璧形足和玉环形足两种足型。

巩县窑：据《中国古窑址瓷片展览》介绍“河南巩县窑创烧于隋，唐代有很大的发展，以白瓷为主，开元时曾为宫廷烧贡瓷；巩县窑唐代还烧三彩陶器……。”由此可见巩县窑也是以烧白瓷为主。在扬州不但出土了数量较多的巩县窑白瓷，还发现了极其重要的唐代青花瓷片资料。出土品种有碗、盘、壶、枕等，其中碗类最多。器形有侈口、圆尖唇、腹壁浅而微曲、玉环底、浅圈足的；有侈口、翻沿圆唇、腹壁较直而微曲、圆饼状实足的；有侈口、口缘略外撇、曲腹、口沿作四葵瓣形、碗里沿四葵瓣口凸起四条直棱、玉璧形圈足等造型。胎质粗松厚重，胎色灰白或白中泛黄，胎土不纯，含有小沙粒，有较为明显的小气孔。器物胎釉之间均施一层化妆土，釉色白中泛黄，釉表多见细密的冰裂纹。青花发色鲜艳，个别青花料中可见明显的黑色斑点。纹饰分写意和几何型图案两种，往往有晕散现象。唐代巩县窑青花的发现把青花的起源上溯到唐代，从而更新了过去的某些看法。

扬州唐代陶器的出土也很丰富，数量最多的为多彩釉陶器，也就是通称的唐三彩。最具代表性的有扬州双桥乡出土的唐三彩双鱼壶^⑦以及三彩三足香炉、三彩抱鹤童子俑、三彩玩具等。从众多的三彩标本来看，大部分是实用器皿，还有一部分做工精细小巧的玩具。和北方地区常见的三彩明器不同，其胎色分白、土黄和黄中泛红三种。有可能其中一部分为扬州附近地区烧制，这将有待于今后的考古发现来加以证明。在扬州出土的三彩器中值得一提的是发现了浮雕人面三彩像，作深目高鼻的胡人形象，并有一种似马来人形象的人头陶范，可以模制。^⑧从这一点可以说明陶瓷这一商品所具有的国际意义。

古代扬州不但汇集着众多的国内陶瓷，更值得注意的是国外产品——波斯陶在扬州也有发现。1983年，古陶瓷研究专家冯先铭先生来扬州陶瓷培训中心讲学，首先确认了当时很多同志还以为是汉代绿釉陶的波斯陶器。波斯陶胎质粗松，吸水率大，胎色偏黄，釉为绿色，釉